

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格局的演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暨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述评

张 琢

关键词： 中国新发展 世界新格局 理论新思考

小 引

今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改革开放也已三十年了。前三十年在毛泽东领导下经历了建国－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折腾，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同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关于这段历史，笔者已在十七年前出版的《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¹中作了较为详实的述评，此不再赘言。

以 1978 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断为标志，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总设计师”和监护人邓小平将其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继夺取政权后的“二次革命”。改革开放和此后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尤其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社会现代化走向了成功的新阶段。同时，由于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辽阔的幅员、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智慧的积累，持续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不断创新的丰富发展经验，使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正改变着世界发展的格局和全球化的内涵。本文主要内容梳理了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的进展；中国的发展所引起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初步总结。

1. 张琢著《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

第一节 中国现代化的新进展

中外学者通过长期对经济史的计量分析比较研究，得出了较有共识性的看法：在 16 世纪，东西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大体处于平衡状态，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和领土规模及历史的积累，直到 18 世纪末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1800 年，中国的人口大约为 3.3 亿，而世界人口总数大约为 10 亿。当时，中国的人口总量和经济总量都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印度次之。²

然而，此际西方已进入了工业革命蒸蒸日上的时代。中国烂熟的农业文明却日渐衰朽，终于自 19 世纪中叶以降在与东进的西方列强的交锋中节节败北，只得在新兴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外烁下，屈尊仿洋，被动地走上现代化的坎坷之路。笔者已对这一过程在《九死一生》中做了梗概描述和分析。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从此中国现代化和共和国的发展史进入了新时期，已逾 30 年，恰为共和国 60 年史之半。30 年的改革和发展的成效及影响，已经大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愈益显著地改变着世界的发展格局。

今年又逢共和国成立 60 年周年大庆，而世界则正在 2008 年秋发端于当代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艰难挣扎，并把引领世界经济的航船脱出苦海复苏的希望，转向了发展中的中国。果然，2009 年新春伊始，中国便不负众望，首先显露出了转危为机、经济回暖的兆头，昭示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入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阶段。

值此之际，与时俱进，以更开阔、更深远的时空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和世界既往发展的成绩和经验教训，无论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继续发展，还是对发展理论的发展，都很有必要。

社会发展是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虽然构成社会系统的各要素在时空上及不同社会阶层中的推进往往是不平衡的，但又是相互关联的，即异步与同步的辩证统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也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人们常常喜欢用腾飞之类的文学语言来描述这一过

2. 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11 月。

程。这种比喻形象、具体，但是需要学理阐释。如果我们把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比作骏马奔腾，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这四大子系统，比作骏马的四条腿。马及其四条腿属同一个有机体，在驰骋的过程中，“探前跌后，蹄间三寻”³，有机联动，协调一致，既不能单足特立独行，也不能四蹄并进，更不能互相别腿。中国现代化在探索中的推进，正好生动地体现了这种有机联动的关系。

一、经济改革与发展

经济是整个社会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中国新时期的改革与发展首先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推进的。改革开放前，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神圣原则而坚持的三大基本特征为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新时期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也正是从相互关联的这三个方面逐步突破、推进和创新的过程。正是这种基础性的变革和发展的成效，根本改变了中国经济的体制和面貌，进而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并通过发展实践突破并更新了传统的经济理论。

1. 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的传统文明为农业文明。中国的传统社会即农业社会。“民以食为天”。即便在工业化的现时代，农业仍然是整个国民经济和全体国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国的改革首先就是由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贫困农民为求生存，私下分田承包单干开始的。这是在实践上对束缚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人民公社”的僵化体制的突破。在此须再回顾一下历史：其实，早在20世纪中期农业合作化期间的“1956年以来，一些地方就在偷偷地搞包产到户。”⁴不过，20余年来，此类现象一直被当作“资本主义自发苗头”、“修正主义倾向”而遭到打压。“社会主义改造”后至改革开放前，尤其在“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期间，国内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表现被概括为“三自一包”，即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单干，成为批判和防范的主要对象。甚至在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发端的

3. 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

4. 参见《1982，“一号文件”为“包产到户”正名》，《新京报》2008年8月27日。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仍然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但是，随着改革的春风转暖，大地渐渐解冻，思想逐步解放，农民的这类自发行动越来越得到体察实情、敢于承担政治责任的开明官员的谅解和袒护。所以，此时私下立约搞“大包干”的安徽小岗村人，才时来运转，得到“松绑”，进而被树立为农村改革的一个历史性的标志。中国的改革不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实际上，包括农村改革在内的整个中国改革的动力，都在20余年逐步编织、勒紧的旧体制的束缚下经历过暗地积蓄、酝酿和潜伏期。储之愈久，其发必速，时机一到，便迸发出来，推动中国的改革突破一道道难关，趟开了发展和创新之路。

1981年，改革开放的闯将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元旦中央一号文件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劳动力），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才正式以中央名义从原则上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此后，执政党和政府相继通过的一系列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逐步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稳定下来，并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家庭经营原系中国农民几千年练就的驾轻就熟的老本行、老本领。这种以物质利益与劳动成果直接联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制，适应了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农民习惯的传统经验和现实要求，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普及迅速，成效显著：农业连年增产，民生显著改善，农村景气复苏。

1982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要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此后，便有步骤地进行了政社分开的改革，在原公社一级恢复了乡镇政府，生产队组织则由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所取代，到1985年上半年，苦苦撑持了27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终于得以正式废除。并进而由农村到城市，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开启了培育市场要素、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之路。

与之相伴，过去遭到打压和埋没的尊重和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主张也重新浮上论坛，激活了迈向市场化的讨论。与实践和理论探索俱进，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4年中共

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报告进一步揭示了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性，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型经济运行机制。但是向市场经济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探索中破浪前行的。1989年政治风波后，当政的有些领导者在对待私有经济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上的反复及举措的失误，就曾导致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减速（1989、1990两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分别降到4.2%、4.1%，为改革开放以来迄今之最低点）。幸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又及时出来，于1990年代初连年南下，再破僵局，廓清思想，拨正航向，敦促加快改革发展步伐。他在1992年春发表的著名的南巡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根本理论上破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陈旧观念，使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脱出了旧意识形态的窠臼。当年十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此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便朝着这个方向不断进取。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经贸组织（WTO），标志着中国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接轨，并促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趋向完善，着力优化企业经营机制，推动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更全面、更深入地融于全球经济。中国现在正继续加快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同时，面对动荡的外部经济环境，为稳定和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肩负起日益重要的大国责任。

2. 所有制结构的改革

反映经济属性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它贯穿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全过程，实现了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后维持了20多年的近乎单一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国有]”和“集体所有”）向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结构转变。

在统计相对比较精确的工业领域，1978年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数量占100%（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数量占24.0%、产值占77.63%；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数量占76.0%、产值占22.37%）。2007年，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以上的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仅占 6.1%、产值占 29.5%，集体企业数仅占 3.9%、产值比重更降至 2.5%。⁵

同时，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和加强。国有企业改革的要义就是探索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改革以前，国有企业仅仅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单位，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任务统一下达，资金统贷统还，物资统一调配，产品统收统销，就业统包统揽，盈亏统由国家承担，企业无自主权。经过一路改革攻坚，国有企业逐步改造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与经营者，实现了从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单位向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的转变，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国有企业通过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造、升级，实力大增，运行质量不断提高。现在，除土地皆为公有（国有和集体所有，土地拥有者所拥有的及市场流转和买卖的都只是土地的有限使用权）外，国有及国有控股的资本、技术密集的大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如金融、石油石化、电力、运输、通信、重要资源开发、重大装备制造、航空航天和军工等）占据着主导地位，保持着控制力。

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中国本来就是私有制下的个体和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非公制经济几乎被消灭殆尽。改革开放前夕，一些缺乏生计的人，如“文化革命”时期下乡返城的“待业知识青年”，以卖“大碗茶”起家，为残存的个体经济注入了新的血液，但直到 1978 年全国也仅有个体从业人员 15 万，占当年全部就业人员的比例不到 0.04%，尚无合法的内资私营企业出现。1979 年第一家经营航空配餐的港资企业入驻北京，成为非公有企业在中国大陆复兴的标志。适应对外开放经济特区的设立及引进外资的需要，中国政府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相关法律。1980 年 12 月浙江省温州市颁发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1982 年国务院制定出《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办法》。个体经济通过原始积累，到 1980 年代中期开始从中孵化出了小具规模的私营企业。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1988～2004 年全国人大

5. 《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8）序》，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年 10 月 7 日。

连续三次修改宪法，一次比一次更明白地确认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经济的合法地位。200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郑重写入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依据宪法精神，从实际出发，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有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经过十多年论争，200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反垄断法》、《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与推进公有制经济改革、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这些法律法规的宗旨就是“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从而为包括私有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及包括公民个人的各种合法收入在内的公私财物，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都是体现中国所有制改革演进的重要标志。

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截至2008年底，全国实有企业971.46万户，实有注册资本金总额43.48万亿元。其中内资实有企业927.96户，注册资本34.58万亿元。在内资企业中私营企业657.42万户、注册资本11.74万亿元，占内资企业总户数的71%、注册资本的34%。正式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实有2917.33万户，注册资本0.9万亿元。外商投资企业43.49万户、实有注册资本金8.9万亿元，占全国企业数的4%、注册资本的20%。世界六大洲已有211个国家（或地区）的外商来华投资，但迄今和可以预见的未来主要投资者仍为香港和台湾等地区的华商。1979～2008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对外借款和外商投资）总计10498亿美元。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924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1%⁶。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企业经济、港-澳-台·外商投资经济，以及多种所有制合股的混合经济体中的私人经济）领域内就业的人数已超过1.37亿人⁷，产值已占到GDP的大半、增量的约2/3，成了扩大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繁荣市场的最大企业群体。

日益精壮的公有制经济与不断拓展的民营经济（当今中国广义民营经济为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各种经济成份的统称）合成了包括内、外资，国有、集体所有、私有、股份合作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相互参股、联营

6.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

7. 参见《改革开放30周年 中国所有制发展新格局》，中国网2008年5月16日。

等混合的经济体，即多元所有制复合结构。这种既具有灵活性又具有可控性的复合动态结构，既为各种经济成份和市场经济的发育开拓着日益广阔的空间，又确保了社会经济运行的稳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即“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巧妙结合，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中国正是凭借日益增强的综合实力和这“两只手”的稳健操作，才使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在 1997 年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在 2008 年 9 月以来由美国华尔街引爆的更大规模的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经济危机中，中国依托国家掌控的雄厚的财力、物力，及时、果断地出台一揽子措施，应对这场全球性经济狂飙的冲击，将危机化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契机，并率先出现了复苏的兆头，更进一步验证了这种双手配合的体制机制的效能和优越性

在上述多种所有制经济构建的实践过程中，中国人正在渐渐形成以新型国有经济、新型合作经济、混合所有经济、社会公众经济等经济类型为主的新型所有制理念。国家正逐步以至完全取消既往实行的区别对待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代之以对各类所有制经济实施统一的、公开的、公平的政策法律体系。

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国有化（公有化）与私有化（民营化）孰优孰劣，中外都有过长期的论争和各种试验，且至今未已。既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尤其中国长期的、大规模的实践，已反复证明：纯粹的公有制或公有化与纯粹的私有制或私有化，同样都是不切实际的、缺乏生命力的。“水至清则无鱼”，唯有多元化的混合经济才更富有活力。至于公有成份与私有成份占整体国民经济的份额孰多孰少，各种经济成份占多大比重合适，则要由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条件来定。这是一个多元复合因素不断调适的动态结构过程。有学者估算，截至 2007 年底，中国的资产性财富共约 115.6 万亿元，其中，国有资产（包括企业、资源、土地、公共设施等）大约占全国生产性总资产的 76%、民间资产（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占 24%⁸。这些构成因素及所占比重都处在不停地消长变动中。现今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变动的大趋势是：国有经济继续优化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增强活力、带动力、控制力和国际影响力，

8. 参见陈志武《以私有化推动经济转型》，《财经》杂志 总 215 期，2008 年 7 月 7 日。

同时逐步从更多的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民营经济继续拓展，成为解决社会就业、服务民生的主力，其中有些强势企业正在和将会发展成混合经济和社会公众经济中的重要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将在各自相应的领域发挥作用，平等竞争，在互动中共同促进中国经济的综合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3. 分配制度的改革

分配制度的改革本来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所有制改革的题中要义。其内容和实质主要体现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分配制度及依此形成的等级制下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俗称“吃大锅饭”），逐步向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的转变。

民众和政府对于分配问题的关切和分配体制的改革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分配方式的改革与整个体制改革相依相伴，也经历了实践和理论的逐步探索和形成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体系的过程。其推进的轨迹，我们按时间顺序看一看几个相关会议的文件中的提法的嬗变及效应即清晰可见。

分配方式的改革，是从突破平均主义的弊端入手的，1978年春，国务院首先发出了《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的通知》，恢复了“文革”前曾经实行过的奖励制度和计件工资制度，初步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当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从而产生示范效应，带动全国各族人民比较快地富裕起来⁹。在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正是由农民从打破“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在分配上，用当时农民自己的话语表述便是：“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经过几年酝酿，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基本原则是：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并对具体落实按劳分配的原则作出了一系列规定。1987年中共十三大决议：“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1992年中共十四大及次年的

9.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

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1997 年中共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2002 年中共十六大正式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收入分配的原则；同时针对在分配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及时提出了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和调节过高收入的对策。

面对日益扩大的城乡、地区发展差距及居民之间的收入的差距，2006 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又重申加强收入分配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以期到 2020 年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方案基本形成。2007 年中共十七大承前启后，针对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强调，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此，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要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不过，原则的确立，不等于事实上的公正合理的分配就能立即全面实现。事实上，这些法律法规的建设和执行过程，是一个极为深刻、激烈的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其最大阻力来自既得利益特权者群体。当然，还有历史形成的其它多种因素衍生的影响。现在，国家和企业都在继续努力改进、优化分配机制，使得参与分配的各要素的分配比例调适得较为科学，符合情理、趋近准确，从而较好地进行各生产要素的配置和功能的发挥，共同促进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改革、创新的磨合过程。现在，这些努力已初现成效：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已显著提高、社会保障已初步改善；在扩大内需和一揽子惠农措施的综合作用下，近年来农村消费的增长率已超过城市；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提速，经济增长率已超过先发展的东部。

4. 产业结构的升级

从反映经济素质的产业结构看，1979 ~ 2007 年，第一次产业的产值虽

然实现了年均 4.6% 的增长，但是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从 1978 年的 28.2% 下降到了 2007 年的 11.1%；第二次产业的产值的比重由 47.9% 微升到 48.5%；而第三次产业的产值的比重则由 23.9% 上升到了 40.4%¹⁰。

这种产业结构的升级，不是、也不可能匀速直线上升。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08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300670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340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5.5%；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146183 亿元，比上年增长 9.3%；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120487 亿元，比上年增长 9.5%。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变为 11.3%、48.6%、40.1%¹¹。这是由于此间，国家大大加强了各种惠农力度，使得一次产业的比重略有反弹，相应第三次产业的比重便略有下降。

同时，三大产业内部的次级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也实现了相应的升级和优化。如 1978 年在第一次产业中，农业（种植业）产值为 1117.5 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397 亿元的近 80%，2008 年其产值上升到了 28044.2 亿元，但其在同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58002.2 亿元中所占的比重却下降到了 48%，平均每年下降约 1%。而同一时期林、牧、渔业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 2003 年起执行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包括农村服务业）中的比重分别上升了 0.4、20 和 7.3 个百分点，分别占 3.8%、35% 和 9%。农产品种类、质量和结构的丰富、优化，大大提高和改善了国民的食品营养结构，并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充裕、优良的供给。而原先包含在大农业中的农村副业（当时与农、林、牧、渔合称为农村经济的“五业”）中的乡镇企业更是“异军突起”。从 1984 年起，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在统计上便正式划归工业。1987 年中国农村非农业产值已逾 4500 亿元，超过了农业产值，标志中国农村经济进入了农业、工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综合发展的新时期。于是，传统上这些归类于大农业范畴内的“副业”已上升为农村经济中新兴的主导产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流取向和农村居民新添的主要增收来源，已不再隶属于农业范畴。

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体现在第三产业，尤其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的变化上。货物进出口总额 2008 年达 25616.3 亿美元，为 1978 年 206.4 亿美元的 124

10.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及《2007 年 GDP 最终核实数》，新华网 2009 年 1 月 14 日。

11.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 年 2 月 26 日。

倍。同时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到 1% 上升到了约 10%。进出口产品的结构更呈现出显著的质变：1980 年出口货物总额为 181.2 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占一半以上，工业制成品不足 50%；而 2008 年出口总额已达 14285.5 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的比重已下降到 5% 以下，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则上升到了 95% 以上。在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1980 年机械及运输设备仅为 8 亿多美元，占出口工业制成品的 9%；而 2008 年机电产品则达 8229.30 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近 58%。尤其高技术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更从微不足道的 0.4% 提高到了 29%，已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期，进口货物初级产品的比重也有所下降；而工业制成品则由 130.6 亿美元上升到了 7703.1 美元，其中机电产品的比重由 39% 上升到了 70%（占进口总额 11330.8 亿美元的 48%）¹²。

这里需顺便指出的是，中国不断扩大和升级的对外开放所引进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在提升外贸商品结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 2008 年底，中国已累计批准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66 万多个，外商实际投资金额 9026.6 亿美元。2008 年外资企业进出口额为 14105.8 亿美元，占中国当年进出口总额的 55%。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额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中国这两类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在 2008 年更一度高达 74% 和 88%¹³。

不过，从时下中外经济发展的格局和趋势看，未来中外贸易和相互的投资，虽然都还会有所增长，但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增长及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相对比重，可能已再难以高升。2008 ~ 2009 年，甚至可能成为这些比重相对下降的拐点。受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等外部因素影响，中国吸引外资及对外贸易正面临严峻挑战，但是远景仍然看好，尤其从质量、结构和进出口平衡的视角看，将会提升和优化。最新投资动向显示，尽管全球经济危机迫使一些外国的投资者缩减了在华投资规模和进度，但是日益壮大的中国经济体却在更积极地利用海外机遇，200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或许将首次超过外国对中国的投资。在国际经济网络格局中，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分工和互补关系，也将加速从纵向垂直关系向横向水平关系转变。

12. 据中国海关总署及《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数据计算。

13. 中国商务部数据；并参考郭彩萍著《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利用外资 8 千亿美元 5 大成就》，中国经济网 2008 年 10 月 21 日。

5. 量的增长与发展方式的转变

(1) 量的增长

从反映经济发展速度的经济总量的增长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2007 年达 257306 亿元，为 1978 年 3645.2 亿元的 70 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15 倍，年均增长率达 10%，约为同期世界的年均增长率的 3 倍。2008 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和世界环境急剧恶化的条件下，中国经济依然达到了 9% 的较高增速，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300670 亿元，约合 4.4 万亿美元，由 30 年前仅占全世界总量的 1.8% 上升到 7.8%，居世界第 3 位。煤、钢、水泥、化肥、棉布、谷物、肉类、籽棉、花生、油菜籽、茶叶和水果等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人均享有量大体与世界人均量持平。

不过，由于各国之间，尤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物价存在不同程度差距，特别是劳动力价格相差悬殊，用名义汇率估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往往过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购买力。因此，在国际比较中，广为采用的估算是实际购买力平价（PPP）法。但是由于各评价机构选择的样本、依据的数据和估算的方法不同，实际操作起来又非常复杂、困难，不同研究机构得出的数值往往互有出入。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 2008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79164 亿国际元（不含港澳台，下同。国际元即国际美元，以美国纽约的购买力定值，1 美元 = 1 国际美元），居世界第 2 位，为同年美国 142646 亿国际元的 55.5%，占世界总量 689968.5 亿国际元的 11.5%。中国人均 GDP 为 5962.70 国际元，居世界 180 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 99 位，相当于世界人均 GDP 10350.89 国际元的 57.6%、美国人均 GDP 46859.06 国际元的 12.7%、日本人均 GDP 34100.07 国际元的 17.5%、印度人均 GDP 2762.27 国际元的 216%。

而美国中央情报局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得出的数字，中国 2008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78000 亿国际元，居世界第 2 位，为同年美国 142900 亿国际元的 54.6%，占世界总量 694900 亿国际元的 11.2%。中国人均 GDP 为 6000 国际元，居世界 192 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 105 位。¹⁴

1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参见 Wor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09;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数据参见 Rank Order — GD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2009 年 4 月。

总之，当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并且成为世界主要制造业基地。2008 年国家拥有的外汇储备已近 2 万亿美元，成了影响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当美、欧、日等经济强国出现经济衰退之时，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对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依赖日益明显。2008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 20%¹⁵，许多国际观察家更把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厚望寄予中国。不过，从经济结构、技术水平、综合素质，尤其人均量看，中国还远低于高收入国家，仍然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国内各地区发展颇不平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的评价指数显示，2005 年上海、北京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其它沿海地区亦多进入工业化后期，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多处于工业化中期或初期，只有西藏尚处于前工业化阶段。总体看，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2020 年前后，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有望达到 100，大体实现工业化。¹⁶

(2) 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也衍生了多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粗放式高增长与资源消耗过高，环境污染过重，区域、城乡发展失衡，国民收入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和发展研究者始终密切关注着形势的演变，直面层出不穷的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总结经验，适时出台对应政策，进行调控。2002 年 11 月 14 日中共十六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正式写进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强化了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引导，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推进到可持续、更健康的新阶段。

现在，新的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正在形成：从地域上看，从主要由东部带动扩展为东、中、西部共同推动；从所有制看，从主要由较为单一的所有制经济带动扩大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合力推动；从市场要素看，从主要依靠投资、外贸、内需拉动转变为内需、投资、外贸协调拉动；从内涵上看，将科技进步、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产品质量优化与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相结合，综合提高发展质量。

15. 《2008 年中国经济：非同寻常的 9%》新华网 2009 年 1 月 22 日。

16. 《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 年 9 月 27 日。

二、社会变迁与社会建设

与经济基础的变化相伴，包括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政治法律和文化观念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也发生了相应的显著而深刻的变化。下面我们继续就这些相关领域的变迁进行综合分析。

1. 社会结构的变化

(1) 人口的变动

人口数量的变动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众多是中国最突出的国情特点，是中国最大的优势也是中国最大的负担。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1978至2008年，中国的人口总量从96259万增长到132802万，净增36543万，人口密度从平均每平方公里100人增加到了138人，约为世界平均密度的3倍，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22%下降到2008年的20%。

生育类型的转变 人口出生率由1978年的18.3%下降到2008年的12.14%，自然增长率从12.00%下降到5.08%¹⁷，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现代型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转变，人口总量呈现出平稳低增长态势。

年龄结构的变化 人均预期寿命由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约40岁、1978年的68岁，提高到了2005年的73岁，已经高于世界平均预期寿命(65.9岁)，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60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2.9%，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9.07%，标志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从年轻型，经过中年型，进入了老年型。全国15~59岁人口的比重为67.44%，年龄中位数为42岁。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和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为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赢得了40年左右的宝贵“人口红利”期。

上述人口变化，根本上是由于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加速和国民文化水平提高的效应。此外，中国政府实施的独特的卓有成效的生育控制亦功不可没，据估算，中国实施计划生育30多年，总共少生4亿多人。中国人口变化的积极作用反过来又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形成为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关系。同时，其引发的负面社会问题，如新生儿的性别比失衡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现在，政府正通过强化保护女婴、调整和逐步健全社会保障等积极对应政策措施来缓解

17. 《中国统计年鉴(2008)》及《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和防范其消极面。同时，庞大的青壮年群体所形成的就业压力，也是沉重的社会难题。幸而，经济和教育的持续高速发展，为他们的就业和自我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更充裕的、日益优化的人力资源。

人口素质的提高 社会统计学者朱庆芳选择颇具代表性的 38 个重要指标，建立了反映社会和谐度的指标体系。它包括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六个子系统。她运用这个指标体系，测出 1978 ~ 2007 年中国人口素质指数增长了 5.5 倍，年均上升 6.7%。¹⁸

国民健康水平普遍提高，首先体现在人口期望寿命的显著延长，其他方面还体现在城乡儿童生长发育水平都有较快提高，成人青春期末期妇女生育期的延长等多项生命指标上。与此同时，肥胖、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各种老年病等“富贵病”，亦呈多发态势。中国近代由于贫困及鸦片的大量输入和吸食，国民体质羸弱，曾被西方人蔑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生活日益改善，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国民体质日益提高。在盛况空前的 2008 年北京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首次取得了金牌及奖牌总数之冠，从运动员、志愿者到广大民众所显示出的中国人的健康向上的风貌，更令世人刮目相看。

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具体体现在国民教育水平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教育事业，是在“文化大革命”对教育冲击、尤其是对高等教育摧毁性破坏的前阶上，重新恢复、振兴起来的。现已建设起了从学前教育 - 初等教育 - 中等教育 - 高等教育及面向残疾人的特殊教育所构成的世界最庞大的完整教育体系。2008 年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已达 99.5%，已基本普及 9 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这“两基”达标人口皆达 99%），15 岁及 15 岁以上文盲人口尚占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 8%（多为老人）。高等教育突飞猛进，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由 1978 年的 85.6 万人增加到 2008 年的 2021 万人，同期研究生毕业生由 9 人跃增为 344825 人¹⁹。各类、各级学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时下，为适应广大青年，尤其“农民工”进城就业与产业升级对劳动者各种专业技能的需求，职业教育培训更受到格外重视和强化。

18. 朱庆芳《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经济建设成就和问题》，载《2009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 12 月。

19. 《中国统计摘要（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年 5 月。

（2）城镇化加速

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直接促成了空前规模的人口大流动（包括机械流动和社会流动），形成了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的剧变。

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控制所限，城市化滞后，1978年城市化率仅为17.9%。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是农民进城务工促成了城市化的突飞猛进。农村经济的复苏为城镇的发展创造了前提。适应农民进城的要求，1984年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自1958年以来实行了26年的以城乡户籍差别为特征的城乡刚性隔绝体制初步松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开始就近向乡镇转移。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外资的引进，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吸引，大批农民涌入东部沿海城市，形成了浩荡的“民工潮”。21世纪以来，伴随中西部内陆地区开发力度的加强，城乡经济的普遍发展，以及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推行，全国各地更自觉有序地加大了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同时，随着城乡交流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及其作用逐步淡化。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有了越来越大的自由流动的条件和实践。

全国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245万增长到2008年的60667万。30年净增4亿多，大约为自新石器时代集镇出现以来，几千年城镇发展人口存量的两倍半，城镇建城区总面积也扩大了40000平方公里，相当于以往2000年所积存的城镇总面积。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5.7%，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大体持平，尚低于世界的平均城市化率（51%），更远低于高收入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78%）。不过，现阶段，中国的城市化正以超过世界平均速度在持续发展（年增长约1个百分点），预计再过几年即可达到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时下，虽与发达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仍相距甚远，然而就绝对数而言，中国既有的这6亿多城镇人口，即已相当于居发达国家人口数前五位的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全部人口的总和。

由于中国地理结构（高原、山地、丘陵、平原等的错综复杂的构成）、自然生态（水量、光热、气温、生物、矿藏及各种资源的配置）、多民族或聚集或分散的传统习俗、各地区产业构成的特点，及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等等因素，决定了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的多样性，庞大的中国人口，不宜过度集中于几个有限的大都会。关于中国城乡现代化，笔者一直主张：“鉴

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畸形城市化带来的弊病（如庞大的贫民窟），中国还是采取有控制的适度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为宜”²⁰。以便捷的信息和交通工具将大、中、小城镇与村落相连，构成既是一体化又具多样性的网络格局，既顺乎自然亦合乎人意，也许是中国现在和未来城乡发展的较为理想而又现实的道路。因此，后现代时期的中国，也未必会集聚成像现在一些发达国家那样高的城市人口集中度。中国城乡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是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目前在成都和重庆等地进行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验，已初步昭示出了这个路子的前景。

（3）就业结构的升级

截至 2007 年底，中国拥有经济活动人口²¹ 78645 万人，就业人员合计 76990 万人。

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就业结构的升级，呈正相关联系，但是由于各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及提高速度的差异，又致使两者的变动比呈现出明显的偏差值：1978 年，中国第一、二、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为 28.2 : 47.9 : 23.9。到 2007 年，这一比例关系演变为 11.1 : 48.5 : 40.4²²。而同期，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则从 70.5 : 17.3 : 12.2 演变为 40.8 : 26.8 : 32.4。

虽然就业结构变动的速度明显低于产业结构变动的速度，但是农业劳动者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毕竟下降了 30%，这就意味着已有 2 亿多人从农业转向了非农产业。而且，即便是农村以务农为主的劳动者，其兼务非农产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都是就业结构现代化的体现，显示出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流动。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则由 1978 年的 2.5 : 1 变为 2007 年的 3.6 : 1，大致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数值相当。

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和多样化，各种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要求较高的职业领域不断拓展，新兴职业类型不断产生，普通教育和专门职业培训教育的发展，推动中国职业结构不断上升。时下，中国政府已确认的合法的职业

20. 同注 1，第 301 页。

21. 经济活动人口：指 16 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口。

22. 2007 年三次产业比重数据为最终核实数，出处同注 17。

细分，已达 1989 个。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与 1982 年人口普查数据比较显示，这 23 年间体力半体力类职业比重下降了 24.4%，而非体力类职业比重则上升了 18.8%。

（4）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分化

社会结构方面最显著的变化，是社会构成中阶级阶层的分解和各种利益群体的形成。经济的自主和择业的自由，带来了经济收入的差别化，改变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后，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收入低下的时代，所形成的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干部）构成的“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金字塔型的身份等级格局。面对社会构成的分化，有的学者以经济收入为标准，将当代中国的社会成份划分为富裕阶层、中等阶层和贫困阶层。也有学者从改革以来利益结构的变迁的角度，把社会利益群体分为特殊获利者集团、普通获利者集团、利益相对受损者集团和社会底层集团。还有学者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社会群体划分为十个阶层。

上述无论哪种划分，经济收入都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指标。从总体看，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国民收入显著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状况普遍改善。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短缺经济”条件下，自 1954 年开始实行粮食凭票供应，到 20 世纪 70 年代，全国凭票供应的商品达 77 种，有的地方多达近百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推进、生产的发展，商品供应日益丰富，凭票供应限项逐步减少，到 1993 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所有供应票证。当今中国确实堪称市场繁荣，供需两旺。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1979～2008 年，城乡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7.2% 和 7.1%。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整体上已由 65.9% 降到 37.9%²³，有近 78% 的家庭的生活已经达到宽裕及以上水平。朱庆芳根据 24 个主要指标组成的小康指标体系，用加

23. 恩格尔系数：指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源于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经验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动提出的一种看法：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者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反之则小。现在国际上常用它来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和家庭的贫富程度或生活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 59% 以上为贫困，50%～59% 为温饱，40%～49% 为宽裕即小康，30%～39% 为比较富裕，低于 30% 为富裕。

权综合指数法计算的结果是：2007 年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已实现 60%。按国家规划，预期 2020 年全面达标。

不过，收入差距显著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20%高收入户与 20%低收入户的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差距，1978 年为 2.7 倍，2007 年扩大到 6.5 倍。另以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²⁴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 0.5，比 1984 年的 0.26 扩大了近 1 倍，不仅超过了 0.4 的警戒线，而且也超过了美、法、日、英、德、韩等国 0.3 ~ 0.4 的水平。收入和消费差，体现于个人之间、不同单位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尤以城乡差距最引人关注、涉及面最广。

中国政府一直把农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不断减轻农民的种种税费负担，在 2006 年历史性地废除了持续达 2600 年的农业税。政府进而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逐步大幅度地加大对“三农”（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投入：加强交通、水利、电力和沼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和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及农业生产资料的综合直接补贴的覆盖面和额度；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落实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及职业培训、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干部、大学生、科技人员和图书下乡支农，等等。1978 ~ 2007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实现了年均 7.1% 的增长²⁵。2008 年，农民的收入增长更创新高，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4761 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 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781 元，实际增长 8.4%。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 3.33 : 1 扩大为 3.36 : 1，绝对差额首次超过了 10000 元人民币²⁶，而且，农民增收的难度也还在加大。因此，中国政府正千方百计强化和采取各种新的惠农、富农措施，以构建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上述各方面的收入差距，都印证出中国已经从一个财富相对均等的社会

24. 基尼系数：以首创者基尼得名，其数值在 0 ~ 1 之间。数值越大，则分配越不平均；反之则越接近平均。市场经济国家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 0.3 ~ 0.4 之间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0.4 以上表示差距偏大。

25.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 7.1%》，新华网 2008 年 10 月 5 日。

26.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 年 2 月 26 日。

变化成了一个贫富差别明显的社会。现今中国社会的发展亟需、也有条件加大对城乡低收入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壮大中等收入阶层，使全社会的公民更公平合理地分享发展成果，以逐步缩小、弥合国民间的收入差距，全面达到小康，走向共同富裕。这也正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2. 社会建设

（1）社会矛盾的呈现

经济的繁荣，使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的绝大多数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状况都得到了显著改善。它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也反映在各种媒体上。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经济发展使短缺经济条件下的民生用品的匮乏已为繁荣的市场所取代，但是粗放式的高速经济增长，却加剧了资源、环境的损耗；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使本来发展条件较好、市场经济要素发育较快的东部地区城市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同时也就更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尤其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造成了社会成员收入、生活水平和心理失衡的加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所有制的改革，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动力，加速了社会流动、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分化，同时也使得社会建设、尤其农村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的状况更显凸出；综合国力的增强，独立自主、灵活务实的和平外交，国际民主原则的伸张，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赞誉，同时，这种汹涌澎湃的发展势头也令国际社会一时难以适应，尤其招致仍怀着“冷战”情节的一些国家和人士的恐慌、敌视和嫉妒，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煞费苦心的遏制伎俩层出不穷。

（2）构建和谐社会

面对这些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中国领导者及时总结、汲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2005年和2006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先后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中共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些建议和决定，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正在落实执行。在经济建设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型经

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并以中部地区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为两型社会建设实验区，探索两型社会的发展道路，积累经验，现已初显成效。在社会建设上，加大投入，逐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协调好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把公平、公正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在政治建设上，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依法治国，实行更加广泛的社会参与。在文化建设上，以更开放的态度、求真务实的精神和民族自信，促进和繁荣多样性的文化事业。同时，将这种处理内政的思维延伸到外交，推动构建和谐亚洲、和谐世界。

（3）民生建设

民生是一切社会、一切国家存在的前提，也是发展经济的首要目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把生存权和发展权视为人权实现的最紧迫的任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最大成就，首先就是历史性地解决了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的温饱问题。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步骤，在上世纪基本实现温饱之后，现在全国人民正处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阶段。预期，本世纪中叶将达到共同富裕，全面实现社会现代化，赶上发达国家，完成“三步曲”。

“小康”，语出儒家经典，原指“大同”理想社会的前阶，后谓经济比较宽裕，可安然度日；现指中等水平的生活。对于小康社会的定义和内涵，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已逐渐深入地开展了研究，并制定出了相当细致的评价指标体系，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主要方面。按照这些指标来衡量，现在少数人已相当富裕，相当多的人过上了小康生活，但是还有几千万人仍处于贫困状态。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2006年以来，国家大幅度增加社会投入，调节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社会建设，民生为本，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各方面。社会建设切切实实地推进，已初显成效：不断改善促进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的积极政策，着重为离开土地的“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广开就业渠道，目前全国实际在业的人口已近8亿；教育的发展已如前述，当下正进一步促进教育机会公平和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医疗的发展与改革，攸关全民福祉，尤以医疗卫生设施薄弱的广大农村“看病难”的问题最为艰巨。经过多方努力，截至2008年底，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已达8.41亿，占农村人口的91.5%。经过长

期论证，2009年4月中国政府出台的新医疗改革方案，将在近期内首先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其他方面，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险等都在稳步推进。

在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逐渐扩大，保障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时，面对城乡社会保障存在的差距和农村社会保障薄弱的状况，政府正积极探索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实现向城乡居民提供较为公平的社会服务。在社会构成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贫困人口，更是亟需帮扶的对象。

改革开始时，9亿多中国人绝大多数都过着物质、文化匮乏的生活。应该肯定，中国政府一贯重视扶贫问题。但是，由于经济发展起点低，即便改革开放启动以后，政策性的贫困线、救济的标准线，起初也只能根据中国的国情定得很低。以后随着整体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物价的上涨、贫富差距的扩大等条件的变化，贫困线标准便不断调升，并初步形成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补助水平的动态调整机制，贫困线和补助额正与国际标准靠近。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1978年贫困标准为每人年收入100元，贫困人口达2.5亿，贫困发生率达30.7%；2007年贫困标准提高到每人年收入785元，贫困人口降为1479万人，贫困发生率降到了1.6%。2008年，农村贫困标准又提高到每人年收入1196元（笔者以这个标准按中国贫困地区的实际购买力平价粗略计算，约合每天1国际元），以此测算，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4007万。同时，全国农村平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上调为每人每月82.3元，月人均补助为49元，低保对象1699.5户、4284.3万人。城市平均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205.3元，月人均补助141元，低保对象1111.1万户、2334.6万人。城乡相加，低保对象合计6610.9万人。还有63.2万人享受了农村传统救济，686.5万人次得到了农村临时救济²⁷。这7000多万低保及救济对象，大约就是现存的中国城乡贫困总人口的概数，约占全国总人口5~6%。

同时，国际上对贫困线的界定亦有所调整。2000年9月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共同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承诺在2015年之前实现“消灭贫穷饥饿”、“普及初等教育”等八大社会发展目标。按照联合

27. 据《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规划财务司2009年2月4日发布）及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国千年发展目标采用每天消费低于 1 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农村人口的比例也已经由 1990 年的 46% 下降到了 2005 年的 10.4%，已提前完成贫困人口减半目标，在落实千年目标的其它多个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另据世界银行在 2008 年 9 月公布的按每天的生活费不足 1.25 美元的贫困线标准计算显示，1981 年至 2005 年全球赤贫人口从 19 亿人下降到了 14 亿，其主要贡献便是中国在消灭贫困上取得的进步，有评论认为，如果不把中国算在内的话，全球赤贫状况甚至在扩大。²⁸

三、民主与法制建设

1. 法制的恢复和建设

“文革”造反，“无法无天”。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从恢复法治秩序做起，逐步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经 30 年努力，当代中国已基本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主要由七个法律部门和三个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构成。七个法律部门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法。三个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截至 2008 年 2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经制定了 229 件现行有效的法律，涵盖了全部七个部门。与法律相配套，国务院制定了近 600 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了 7000 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 600 多件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还制定了大量规章²⁹。

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时期，法律的制定、修改和更新，也必须与时俱进。这就决定了中国法制建设的动态性特征。现行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大体与各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同步，较好地保障了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保障了现代化的有序进行。

2. 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

本目所谓社会组织为广义的概念：包括国家组织、市场组织及各类民间

28. 《中国脱贫成就掩盖世界贫困状况》，多维新闻网 2008 年 9 月 10 日。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办公室 2008 年 2 月 28 日发表《中国法治建设》白皮书。

社团组织。

改革开放前,在近乎单一的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体制下,中国的各种社会组织,亦被整合为单一化的结构体系,国家组织掌控着各种资源,各级政府通过各类企事业单位、城乡社区集体组织,管理全社会的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而各种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则依存于国家计划配置的各种资源,执行国家分派的任务,实质上都是国家组织的派生组织或外围组织。直言之,就是政府包办一切。而像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最多、国情极为复杂的大国,事无巨细都由国家来包办,是包办不了、也包办不好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就集中曝露了这种体制的弊端;而“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也正是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入手,并逐步扩及整个国家组织和其它经济社会组织的体制机制,包括职能、结构及相互关系的转变与组织创新。

国家组织职能的转变与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是体现国家组织和国家管理进向现代化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首先,是国家组织的职能由全能型政府逐步向有限政府转变,国家组织逐步从微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直接组织者和承办者角色退出,并向市场部门和社会组织让渡组织空间,从而归位于服务社会的公共上层建筑(公共权威)。与此相应,逐步进行机构调整、精简和创新,以适应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建设与管理的需要,使国家组织结构的设置更为科学,国家公务员的专业素质得到相应提高,为民服务切实到位。

市场经济组织体系的构建 与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多种所有制的企业的复兴及经营机制的变化相应,在农村,两亿多个家庭恢复了自主经营自我管理的微观社会经济组织的功能;在城市,形成了由三千多万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和企业)构成的市场经济组织体系。这些具有自主经营权的市场经济组织,具体开展经营活动,接受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监管和指导。

社会组织的勃兴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国家在机构改革过程中,逐步将原来的经济管理部门,分离重组为社会组织(主要是行业协会),逐步明确原有各种社会团体的社会组织属性,逐步有序地推进城乡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建设。同时,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国家逐步从微观社会生活组织者和承办者的角色退出的过程,也是社会人自主意识和人文精神日益觉醒、升

华的过程。于是，自我组织、自我实现的民间组织便应运而生，不仅填补了官方组织让渡出的空间，还开拓出了日益丰富的新的活动领域。政府在向民间让渡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逐步探索、不断改善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政策法律保障，并针对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如开展社会组织“自律与诚信建设”活动，以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成长。政府向民间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已成为政府转变职能、建设服务型社会的重要渠道之一。有了这样的社会经济土壤和政策环境，社会组织便如雨后春笋般成长。民政部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登记的社团组织仅 2000 多个，而到 2008 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已近 40 万个（其中社会团体 22 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 17.8 个、基金会 1390 个）。这些社会组织业务范围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事、体育、环境保护、法律服务、社会中介服务、工商服务、宗教、国际合作交流及其他涉外活动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³⁰。

3. 公民社会的发育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思想解放乘风破浪地推进。在越来越开放、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国民意识由传统向现代渐渐蜕变，政治民主化艰难徐行，民众的社会参与和民间组织日益活跃，教育的普及尤其青少年健康向上的个性一代比一代增强……凡此种种社会生活的悄然变化，都透露着公民社会生态要素集聚的消息，昭示出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公民社会的胎动。其中最抢眼的征兆，就是公益志愿者的行动和网络民主的勃兴。

公益志愿者——公民社会的报春使者 2008 年，对中国来说，是惊天动地、大悲大喜的一年。这年 5 月 12 日发生了以四川汶川为中心、波及大东亚的 8 级特大地震。面对突如其来的惨重灾难，中国政府迅速的应急响应、组织动员能力，来自四面八方的志愿救灾者的奉献精神，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令举世赞叹。这年，全国参与各种抗震救活动的志愿者总数估计超

30. 数据详见中国社会组织网，历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之社会组织部分；分析框架参考陈光金著《当前我国若干重大社会结构变化与结构性矛盾》，载 2007 年 11 月 1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过 1000 万人；全国义捐总额近 1000 亿元，为上年的 3 倍多³¹。同年 8 月，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其间，有 7 万多名志愿者在馆场内直接为奥运会服务，40 万名城市志愿者在街市和馆场周围提供城市志愿服务，100 万名社会志愿者在社区提供服务。因北京奥运的主要场馆，形似鸟巢，为标志性建筑，亮相于这次运动会的大学生志愿者们便被人们赋予了“鸟巢一代”的称号。北京奥运被视为中国年轻一代在全世界面前成功的形象展示。连一向蔑视中国人、直到不久前还把“支那人”及“三国人”³²的蔑称挂在嘴边的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感叹：“北京的青年志愿者亲切而不卑不亢，和日本的大学生不同，他们对国家前途明显充满了希望，他们让人感到青春的跃动，真是了不起啊！”其实，这种精神早已溢出了国门：奥运圣火在全球传递过程中，在欧、美、日等国遭到了蓄谋已久的干扰，以中国留学生为主体的志愿者，便奋然发起护火运动，在巴黎，在洛杉矶，在长野……在所有圣火传递遭到阻拦的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挺身而出，手拉手挡住抢夺圣火的袭击者，护着圣火昂然而行，沉勇无畏而又理性文明³³。这些志愿者绝大多数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俗称“80 后”。有评论说：“吮吸改革开放新鲜乳汁长大的‘80 后’，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国际化、最有个性、最时尚的一代人”³⁴。

同时，各种公义善行在日常生活中正蔚然成风，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更令人感佩的是，愈来愈多的人在做公益行动时所崇尚的是隐姓埋名的默默奉献，毫不张扬，这是更高的境界。³⁵

社会学者李培林、陈光金总结道：“中国公民志愿行动，是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和社会进步的一个种要标志。”³⁶

网上民主 具有时代和中国特色的“网上民主”的活跃，是凸显中国公民自由和公民社会的另一大亮点。

31. 《309 亿到千亿 中国善款一年“井喷”3 倍多仍难解渴》，中国新闻网 2009 年 1 月 27 日。

32. “三国人”，系指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曾沦为日本统治的台湾人、朝鲜人和满洲人。

33. 潘子刚《日本长野护火运动的社会学分析》，日本爱知大学大学院编《爱知論叢》2009 年第 86 号。

34. 祝华新、单学刚、胡江《2008 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载《2009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 12 月。

35. 参见王高利《公益在行动》，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8 年 5 月版。

36. 李培林、陈光金《力挽狂澜：中国社会发展迎接新挑战——2008～2009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载《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 12 月。

上世纪中叶发轫的电子信息革命，启动了全球信息化的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IT产业的迅猛发展，大大降低了电脑、程控通讯工具的成本和价格。教育，尤其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为使用电脑、手机和互联网造就了为数众多的用户。从1989年3月13日万维网在欧洲诞生，至今仅仅20年，中国已成为全球民用电脑、手机的最大生产和使用国，互联网上网人数已逾3亿，总数超过美国，跃升为世界第一。互联网普及率，目前大体与全球平均水平持平，尚低于美、日、韩等国，但是增速飞快。互联网已成为社会各阶层获得信息、利益表达、情感宣泄、思想交流、社会监督的重要渠道、个人与公众的共有媒体。上网者简称为“网民”，网民互称“网友”。中国网民非常关注时事。

2008年为中国多事之秋，累有重大事情发生。而一旦发生，在互联网上便很快形成关注热点，仅几大新闻网站，日上新闻便动辄上万条，浏览量更以数十亿计。如今，互联网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信息源，并以其快捷敏锐超越传统媒体。公众通过信息网络，针对时事和社会现象发表意见，形成“网络舆论”。每当“突发事件”露头之后，网民往往蜂拥而上，穷追不舍，层层剥进，揭发事实真相，伸张公道正义，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使捂盖子、支吾搪塞的肇事者、不作为或胡作非为的庸官或贪官污吏，无所遁其形。网友既充当“公民记者”，又是读者和评论者，多重角色，却没有身份等级之别，“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率性而言，直抒胸臆，针砭时弊，嬉笑怒骂，机智幽默。由于传统媒体受到严格管制，负有“舆论导向”的使命，官腔套话，刻板木讷，于是受众便越发转向生动活泼的网络平台。

政府对网络舆情，从茫然无措转向日益重视，从消极被动转向积极回应。2008年6月2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人民网，与网民在线对话，并指示：要正视舆论“新格局”，“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是一个重要渠道”³⁷。一些地方官员争相跟进，转被动为主动，官与民，传统媒体与新兴网络，相互沟通，渐成风气。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

37. 参见《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载《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

议(简称“两会”)开幕前夕,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政府网上,与网民在线交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在回应网民涉及官员腐败的问题时说,为了对抗腐败行为,政府正在准备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个问题,在中国已是一个拖了20多年的老大难问题了,早在1988年就有人提出了要求官员申报财产的立法动议,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正式将《财产申报法》列入了立法规划,至今尚无下落。据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调查,97%的受调查官员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而2008年人民网的调查则显示,90.1%的网民认为,有必要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2009年“两会”期间,有官员被媒体问及此事时,反诘道: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的财产?此言一出,当天就有署名“天乙”的网民(一位高中教师)率先发帖,坦荡地将自己的财产明细分类公布出来,以百姓身份为官员做示范。此帖一出,便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跟帖和点击。这场向官员施压“晾财产”的舆论,正在多种媒体上扩散。诚可谓,网络恢恢,疏而不漏。处当今之中国,不知网络民意,不识网络监督,是越来越难以为官了。

综上,各种场合的社会参与者,人们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称谓:志愿者、“80后”、“火炬一代”、“鸟巢一代”、“网民”…名称不同,却都焕发着相同的现代性的时代精神。他们出现在迥然不同的场境:灾区,香榭里舍大街,“鸟巢”,城乡社区,“希望小学”,网络平台……在迥异的场境中,以不同的角色出现,彰显出的却都是现代公民的风貌。

当然,凡事都有二重性。就从网络平台上看,又何尝不是良莠不齐:幼稚,浮躁,偏激,谩骂……更不用说令人毛骨悚然的“人肉搜索”等“网上暴力”现象及其令人担忧的民粹倾向,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民间话语暴力跟滥用公权一样恐怖”³⁸。但是,有些幼稚的现象,在他们初出茅庐的时候,可以说是难免的,同样也像我们在网络平台上所见,他们在互动中,在相互驳诘、论争中,正不断深化对社会的认识,逐步成熟,趋向理性。这也正是当今中国舆论生态演化的生动体现。改革者们对于现代公民素养培育的艰巨性,也须有更长远、更充分、更切实的思想准备。

至此,我们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变迁作一总结性概括了。

38. 笑蜀《民间话语暴力跟滥用公权一样恐怖》,载《南方周末》2009年3月26日。

经济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30年持续高速发展，总体上已推进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同时也为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相应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迄今改革发展的成绩，突出显现在这个基础领域，本文论述的主要篇幅也放在这方面。

社会发展以经济为基础，并与经济的改革发展相因相伴，展现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聚焦于以民生为中心的社会建设。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解决民生的第一步：农民当时把承包的土地称为求生存的“救命田”。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正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的继续。

政治是核心（中枢）。政治改革和建设是一个贯穿于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的改革和发展的红线。由于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不断强化，无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生活作风问题”，都要“上纲上线”，即上到“政治高度”才算“够水平”。在这种泛政治化的前提下启动的无论是那个领域的改革，都不能不触动政治神经。故，广义地讲，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便都带有政治性。从整体性视觉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是政治改革和发展的成效的见证，政治改革和发展就寓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和发展之中。但是就严格的学理而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毕竟属于不同的范畴。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建设，在“硬件”方面，本文着重描述的是法制和法律体系的恢复和构建情况；在“软件”方面，则着眼于公民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勃兴，尤其“网上民主”的创新。正由于政治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集中体现，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政治改革更异常敏感，不断受到“左”右干扰，举步维艰。然而，“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³⁹。经30年不懈努力，审时度势，排除万难，徐徐推进，回头一看，政治氛围已大有隔世之感，尤其私域空间的个人自由的扩大，更是每个公民都能切身体验到的。政治的改革和发展，同其他方面一样，都是一个动态过程。改革的方案，操作的程序，推进的速度，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社会经济基础和国民的素质与意愿的发展程度，切忌浮躁，更不能停滞、倒退。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为三个方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各方面

39. 《大戴礼记·劝学》。

的监督，使政府的行政运转依法进行。⁴⁰

文化概念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涵盖了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就此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各领域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便都可以视为文化发展的体现。而狭义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思想解放、观念转变则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始终。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即国民日常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现象，更是日新月异。文化体制的改革，大批文化机构（如出版社）从事业单位向企业组织的转变，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等等，方兴未艾。学术文化从“文革”后的废墟上得到复兴⁴¹，近代以来学术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正从冲突趋向融合。⁴²

第二节 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验经

在梳理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之后，本节试以更深广的时空视野，看看外部世界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反应与评价，中国的复兴所引起的世界发展的格局的变化；并就中国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启示从学理上进行初步总结，对发展论坛上常见的“发展模式”、“普世价值”等概念进行再思考。

一、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格局的变化

中国 1978 的改革开放和此后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尤其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社会现代化走向了成功的新阶段。同时，由于中国拥有的庞大人口规模、辽阔的幅员、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智慧的积累，持续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不断创新的丰富发展经验，使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中国的发展成为改变世界发展格局的划时代标志。

1. 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地位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西方人士多期

40. 参见《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人民日报》2009 年 3 月 14 日。

41. 张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文化复兴的概观》，载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编辑并发行《现代中国における思想、社会と文化》，2007 年 3 月。

42. 参见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编《东西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

待中国会向他们臆想的方向演变，开始多持积极欢迎的态度，自然也夹杂着不同程度的疑惑和等着瞧的成分。八十年代末，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中国崩溃论”一度甚嚣尘上。但是以后的事态的发展却出其意料，按邓小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决不当头、韬光养晦、善于守拙、抓住机遇、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个改革开放的新举措，突破一道道难关险阻（包括旧体制的障碍、“左”右的干扰和外部势力的“围堵”、“遏制”，等等），1992年以来又恢复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接踵而来的便是西方放出的一波接一波改头换面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政治不确定论”等等，不一而足。

当中国崛起已成无可阻挡的现实的时候，西方转而又给中国套上“利益攸关方”和“大国责任论”的笼头，当然，它们没有，也不会放弃一切遏制中国的机会和习惯性的遏制反应。对于这种战术，用西方训兽师的习惯用语叫做胡萝卜加大棒，借中国思想家鲁迅一针见血的语言表述则是捧杀与棒杀。对于这些招数，中国的回应是：你软硬兼施，我刚柔相济，独立自主，坚持和平发展，首先办好自己的事，同时胸怀世界，审时度势，量力而为，积极推进国际参与，自塑国际形象。

总体上看，现在国际上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现象的认识已渐趋理性，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测日益准确、稳定。但是对于一些涉华尚浅的外国旁观者来说，由于中国国情的异常复杂和变幻莫测，“中国始终仍是个谜”。未来的中国观察，歧见仍在所难免，各种杂音，甚至两极化的评论，也还将续存和变换。

尽管如此，国际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及其意义的评价还是与时俱升的，现在已经提高到了世界史的划时代的高度。此类评论充斥着世界各种有国际影响的媒体，举不胜举。例如，2006年5月25日英国《卫报》上刊登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教授马丁·雅克的一篇历史总结性的文章题目就叫做《如果说20世纪止于1989年，那么21世纪始于1978年》。该文写道：1989年是20世纪末的决定性时刻。以撤除柏林墙为标志，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美国成为全球的唯一超级大国，标志着20世纪的结束。“1989年首先是一个欧洲的事件，或许我们在今后很长时间里将发现，它是最后一个既是全球又是欧洲的大事。”1978年本来纯粹是一个中国的时刻，但是以后的事态发展，却显示出“它关系到创造一段全然不同的历史。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这个世界一直被西方，也就是欧洲和美国所垄断。直到

上世纪中叶之前，人们还普遍认为，那些曾经遭受欧洲殖民统治的国家注定处于永久的依附和不发达地位。东亚的崛起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变革已经决定性地使全球重心东移”。“虽然 1978 年离现在并不遥远，但我们已经沿着这条创造一个全新世界的道路走得很远”。“在新世纪开始之前，美国世纪就已经结束了。本世纪——或者说本世纪头 50 年——的主题将是现存超级大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⁴³

2. 世界新格局

上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对抗的格局。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地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接着，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形势下，又分别形成了以美国为首、包括西欧北美发达国家的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和以苏联为首、包括东欧社会主义诸国的华沙条约军事集团，形成两大阵营、两大军事集团对垒的“冷战”格局。然而，在东方，自 1950 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的分歧便逐步扩大，直至激化为 1960 年代的边界军事冲突。1974 年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通过对世界各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的分析，从战略上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的划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亚、非、拉美及其他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构成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划分为国际舆论所广为引用，其中的“第三世界”后来泛化为发展中国家的别名。中国自我定位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978 年中国在“总设计师”邓小平主导下启动了在探索中渐进的改革，其过程和成就已如上节所述。苏联则服下了由美国谋士开出的“休克疗法”的处方，导致苏联东欧集团的迅速解体，其最具象征性和标志性的事件便是分隔东、西柏林的隔离墙的拆除。当即，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弗朗西斯·福山便以凯歌式的笔调大胆地写下了响彻世界的宣言《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我们正在见证的不仅是冷战的结束，或者是二战后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的结束，而是下面这种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思想进化史的终结，而且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将作为政府的最终

43. 马丁·雅克《如果说 20 世纪止于 1989 年，那么 21 世纪始于 1978 年》，原载英国《卫报》2006 年 5 月 25 日，参见新华通讯社编《参考消息》2006 年 5 月 27 日。

形式得到普遍推广。”

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后，残存的俄罗斯继续在颓败中颤抖，失却了超级大国的光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趾高气扬，昂首天外，“一览众山小”。美国虽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结成了七国集团（简称G7）。这个“富国俱乐部”在顶盛期的产值占到全球的约80%，但是为富不仁，小心翼翼维护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对于长期挣扎在贫困、动乱中的穷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难题，除空言人道敷衍之外，少见实效的作为，尤其对那些最贫困国家的援助，更是口惠实不至，空头支票多，实际兑现少，使世界发展格局中的南北差距更加拉大。G7遂成了凌驾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头顶上的空中楼阁里的清谈馆。而关在清谈馆外的其他国家却没有耐心去消极等待这种清谈的恩赐。于是，面对日益严峻的地区安全和核扩散等一系列全球性棘手问题，力不从心的七国集团又回头将昔日冷战时期的老对手、残存的俄罗斯拉入，扩充为八国集团（G8），半是安抚，半是无奈。面对全球经济、政治、安全难题，G8除了照例发表一篇篇空洞公报宣言外，仍难以有实际价值的作为。中国在度过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中国改革开放的监护人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着重反思了“左”右倾的错误，尤其“左”祸的长期危害，摒弃了长期缠绕不清的“姓资”与“姓社”之争，敦促、激励各级领导干部和全国人民进行更大胆的改革，推动中国的发展提速前进。印度亦于1991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稳步快速增长，在发展中大国中其增速仅次于中国。更多的中小国家，在历尽磨难后，也先后悄然迈上了发展的征程。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扩大决策圈和影响力，八国集团又于1999年12月在柏林发起组建包括各主要新兴经济体的二十国论坛（G20）。G20成员包括八国集团，加上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韩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及欧盟，囊括了世界多数大中经济体。这个非正式的对话机制的宗旨为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利害相关的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这就是20世纪落幕时的国际大格局。

进入21世纪以后，一方面是中国在新的基础上以递增的势头继续高速推进。另一方面是世界仅存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接连遭到两次重创。

头一次是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来自外部的恐怖组织摧毁纽约世贸大

楼的自杀式恐怖袭击（史称“9.11事件”）。这可以视为美国从巅峰下挫的转折性标志。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正奉行强硬的“新保守主义”，认为可以凭借实力，运用权力和意志，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来推动历史达到自由民主目标。在“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便立即以“反恐”之名，挥兵阿富汗打击塔里班，战事未了，紧接着又进攻伊拉克。迄今战事已持续十年，造成大量军民人员伤亡，单美方耗资已经远超过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费，而效果则与当初出兵时动听的承诺相反，除了给这两国无辜的人民平添惨烈的人道灾难外，美军至今仍难以脱身。同时在其他多国策动的一系列“颜色革命”，亦导致这些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动乱，迄今未已。鉴于这些乱象，使得连前面提到过的曾已宣告“历史的终结”的那位理论家弗兰西斯·福山，经过几年观察也废弃了前言，断然宣布与新保守主义者决裂。他在2006年3月出版的新书《新保守主义之后：美国处在十字路口》中写道：“我已经得出结论，新保守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象征还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已经演变成了某种不能再支持的东西。无论它的复杂根源是什么，它已同用实力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单边主义和美国霸权结合在一起。”他通过从现实中民主的异化而引发的激进化和恐怖主义的大量事实的教训的反省中还得出结论：对民主的要求和改革必须来自一个国家的内部，而不能由外来者强加给一个不想要民主的国家。促进民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等待经济和政治条件的逐步成熟。“我相信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有一个普遍的进程。”这几乎就是在为中国式渐进推进民主建设的理论、主张和操作程序背书，因此，他自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不奇怪了⁴⁴。

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分析了世界各国力量急剧消长变动的局势，及诸如（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巴西）阿雷格里世界社会论坛上不同思想观点的分歧所体现出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交锋后，指出：随着美国世界霸权的丧失，未来20年或30年世界将出现5至8个权力中心，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竞争。目前

44. 参见《他为何要背叛新保守主义——英报分析著名学者福山思想演变过程》，新华通讯社编《参考消息》2006年3月25日；周琪《福山对“布什主义”及其“新保守主义”理念的抨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4月11日。

现实的世界三大权力中心是美国、欧盟和东亚⁴⁵。这便是“9.11 事件”后，世界向多极化演变的概括。

对于改变当今世界发展格局影响次大的是紧随中国之后崛起的另一发展中大国印度。印度，有与中国同样悠久的历史，2008 年人口总数已逾 11.5 亿，仅次于中国居世界第二（人口增速高于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白皮书 2007》推算 2050 年印度人口将达 16.6 亿，届时超过中国 2.5 亿），现有国土面积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经济改革及起飞比中国晚十来年，发展速度稍逊于中国，目前经济总量约为中国的 40%。基于这两个毗邻的世界数一数二的发展中大国有这么多相似、相近的国情和机缘，2005 年印度商务部长斋拉姆·拉梅什特地创造出了新英文字“CHINDIA”，印度的中国问题专家谭中将它译作“中印大同”，意味着中国和印度共同前进与合作⁴⁶。现今中印两国共拥有占世界近 40% 的人口。在 1825 年时两国占全世界经济的份额大约也是 40%，经两百年由沉沦到复兴的“U”型演变，据美国高盛公司的预测，到 2025 年两国又会重新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 40%，即人均量大体与世界持平。

“9.11 事件”七年后的 2008 年，同样在 9 月中旬，同样是在美国纽约，又爆发了积郁已久的内缘性金融海啸，引发了自 1929 年美国大萧条以后的最大的经济危机，并拖累全球经济陷入了衰退。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经济当然也难免受到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但是由于中国已经打下了一个较为厚实的基础：国家掌握着足够的物质的和行政的调控手段与良好的应变机制；自 2000 年以来已接连启动了面向内陆的西部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2003 年以来为建设新农村，更大幅度增加了对农村、农业的投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把加强民生建设提上了日程；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战略，正加紧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升级和扩大内需、调整发展动力结构的转换过程。这一切都是应对国际经济危机冲击的有利的前提条件，诚如美国中国经济专家盖保得博士所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进步，无疑加强了中国经济应

45. 关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在本书初版中已作了重点介绍。此处他对目前和未来几十年世界多极权力中心的分析预告，见于 2006 年 12 月 4 日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大学的演讲，参见新华社编《参考消息》2006 年 12 月 17 日。

46. 谭中《实现“中印大同”建设“和谐亚洲”》，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 年 7 月 24 日。

对全球性冲击的弹性。中国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注重实效和实践的领导层及决策体系，可以比世界上多数国家更快地作出决策并付诸实施。一旦需要，他们将动用广泛的行政手段支持市场稳定。这种政策弹性是中国经济改革演进中所产生的最令人受益的成果之一。”⁴⁷

正是凭借这些条件，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魔影扑来的第一时间，中国政府便立即改弦更张，将原来抑制通货膨胀、防范经济过热的宏观经济调控方案，转换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的“一揽子”具体应对计划和措施。由于决策及时，方法得当，执行有力，很快见效：中国经济在熬过2008年的严冬之后，2009年新春伊始便与季节同步回暖，进而提挡升位，驶上了新的持续发展的征程，成为引领亚洲和世界共克时艰，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曾几何时，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还在不停地严厉指责中国的国有经济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甚至至今美欧发达国家仍未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当放纵的华尔街金融大鳄孵化的毒痈终于穿疱，触发金融—经济危机，并迅猛向全球扩散之时，美国也不得不回归政府管制，断然伸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强力干预市场运作，斥巨额国资来拯救企业巨头，并对受援企业从改革方案到高管的任免、薪酬等，进行严格监管，同时向中国和世界发出同舟共济渡劫波的呼吁。这就难怪有人说美国转向了社会主义，甚至“美国才更社会主义”了。

一方面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冉冉上升，另一方面是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的支配力的相对下降，原先一头沉的跷跷板开始显著地加速了朝两头平衡的方向的转动，而利益攸关的两国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种微妙的动态平衡游戏。坐在旁边冷眼观看的法国人，早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一年多以前，就开始揣度这种蹊跷游戏的奥秘：“‘中美’超越了合作伙伴关系，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的双头大国”⁴⁸。接着，在2008年夏季出版的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特腾的文章便提出了“G2”（两国集团）的构想。2009年1月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在美国深陷

47. 《增长源于内需 政策注重实效 中国经济前景依然乐观——访美国中国经济专家盖保德博士》，新华网2008年9月21日。

48. 《中国—美国或“中美”》，法国《解放报》2007年8月6日，参见新华通讯社编《参考消息》2007年8月8日。

金融危机之上任后，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第一通电话便明言：“没有哪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像美中关系这样重要”。同时，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美建交 30 周年活动的晚宴上，于任内实现中美建交的美国前总统卡特致辞也说：“美中关系已经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关系。”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讨论会上建议将中美对话机制命名为“G2”（中美两国集团），并认为“能够改变世界的就是 G2”。为了形容两国经济的共生关系，美方甚至端出了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教授创造的“中美国（Chimerica）”概念⁴⁹。我们不排除日本媒体在报道此事时所说的其背后的实用主义的动机⁵⁰。美国的总统们自己也不讳言，他们的外交是从美国利益的需要出发的。其实，世界各国的外交的出发点首先也都是利己的，但旨意却大相径庭：一种是损人利己，往往从损人开始，害己告终；另一种从善意出发，在实现自己利益的同时，也照顾对方的利益，不仅双赢，且兼利天下，惠及全人类。这是两种世界观、价值观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原则区别。从认知能力上看，有远见卓识者，善于将牟取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统一；相反，另类短视的实用主义，往往是图了眼前，却丢了未来。在国际事务上，远见卓识则来源于真切地把握世界格局的演变趋势。因此，透过美国政要和战略分析家们的言论，中国更注重的是其中所体现的他们对时局的变化评估的实际内涵和意图。中国当然不会因此就飘飘然当真以为自己俨然已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或主宰世界的“双强”之一了。中国是有自知之明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中国在回应外界的反应和处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的关系时，是有分寸的、得体的。笔者认为，从综合实力看，至少在可预见的十来年内，美国仍然是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看，中国如果顺利的话，也还需要几十年，才能赶上发达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而且即使成了发达国家，中国也永远不会做带有霸权

49. “中美国（Chimerica）”为美国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提出的一个经济体概念，包括中美两国。它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占全球面积的 13%、人口的 1/4、GDP 的 1/3。弗格森教授解释说，“中美国”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建立在贸易和投资基础上的共生关系。这一结合的结果是，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引擎，5 年来创造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参见汤姆·霍兰《联合总统先生，欢迎来到中美国》，香港《华南早报》2008 年 11 月 6 日），新华通讯社编《参考消息》2008 年 11 月 11 日。

50. 伊藤正《实用主义的“中美国”论》，日本《产经新闻》2009 年 1 月 16 日，参见新华通讯社编《参考消息》2009 年 1 月 22 日。

印记的“超级大国”。就现实而言，平等、积极、全面合作的中美关系，无论对两国自身，还是对全球来说，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是可以确认的。同时，这至少也印证了在全球化的今天，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中国的发展和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上升，正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取得的，同时又以自己的份量和特色，改变着全球的发展格局及全球化的内涵。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每四年发表一次全球趋势报告。直到2004年12月发表的名为《绘制未来的全球地图》的报告，还信心满满地预测到2020年时“美国将继续处于主宰地位，大多数主要国家已经放弃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想法。”四年以后，当华尔街引爆的金融海啸之际，该会于2008年11月20日发布的题为《2025年全球趋势：一个转换中的世界》的报告便改调称：今后20年为“建立新秩序的过渡期”。自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至今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将土崩瓦解，国际局势可能出现动荡。美国不再是自二战以来的那个不可匹敌的超级大国，而是一个更具变化性、更平衡的世界中的“第一名”。这使得美国不能继续推行布什政府时期的单边主义。在今后的20年中，将很少有国家对世界的影响力比中国大。虽然美国仍将维持相对优势，但是中国和印度作为多极化时代的新兴大国，在影响力方面将和美国展开竞争。其趋势是美国的影响力将逐渐衰弱，中国和印度则将明显崛起，届时世界将迎来美中印“三国鼎立”的时代。该报告还指出，目前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仅仅是重新调整全球经济秩序的第一阶段。由于这一报告发表的时刻及其内容基调的大转变，一出台便备受关注。欧洲资深政治家、末代港督、现任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在其新著《挺进21世纪》中也认为，这个世界未来的核心就是中美关系及北京与亚洲崛起大国印度的关系。

比预测未来的“三国鼎立”说更早和持续热议的还有高盛集团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2003年首次提出的“金砖四国”（BRICs）论。“金砖四国”指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由四国英文国名（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开头字母的谐音英文单词BRICK（砖头）而得名。这四国，地大物博，面积3819万平方公里，占全世界1/4以上；人口众多，2007年达28亿人，占世界42%；四国都是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快，2006～2008年综合年均增长率高达10.7%以上，按购买力平价计，2007年经济总额已占全球总量的1/5，高盛预测2027年中国经

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届时金砖四国的经济规模将与七大发达工业国家集团比肩⁵¹。2008 年四国对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 50%，作为新兴的消费大国不断扩大的内需将持续推动经济繁荣。鉴于 2009 年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均为负增长的状况，有关专家预测四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额可能上升到 70%。2008 年，四国外长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首次正式以“金砖四国”的名称举行会议。此后，在各种场合，四国首脑和财经政要更频繁聚会，协同配合争取扩大在多边金融领域的话语权、表决权和规则制定权。2009 年 6 月 16 日“金砖四国”领导人在叶卡捷琳堡首次正式会晤，达成三大共识：一是扩大四国战略共识，增强战略互信；二是积极协调立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作贡献；三是规划四国今后对话与合作方向，推动四国合作沿着健康稳定地不断向前发展。

当 2008 年金融风暴把美、欧、日冲击得焦头烂额、自身难保时，它们便把遏制经济衰退、拉动经济复苏的希望，转向了能量日增的中、印等新兴经济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2007 年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新增产值已占全球 GDP 新增产值的 2/3。美、英先后于 2008 年 11 月和 2009 年 4 月，接连两次紧急邀请 20 国领导人举行峰会商讨对策。此时 G20 成员共约占有世界人口的 2/3、生产总值的 90%、贸易的 80%，对于稳定世界经济具有决定性作用。出席峰会的中国领导人以诚恳、负责、务实的态度阐明了本国应对危机挑战所采取的措施，向世界发出了坚定信心共克时艰的强音。两次峰会和中国的作为，为国际社会所高度关注。第一次峰会一结束，东道国的媒体《今日美国》便发表总结性的评论说：刚刚结束的 20 国峰会发出的信号表明，以八国集团为代表的富国俱乐部即将过气，未来世界将由包括主要发展中国家在内的 20 国集团主导。这表明，二战后诞生的国际秩序将让位一个能反映新世纪客观现实的国际秩序⁵²。第二次峰会的东道主英国《独立报》在题为《一个经济巨人正在形成》的评论中说，伦敦峰会很可能被视为中国终于破茧而出，在一个以它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世界伸张自己的利益的时刻⁵³。无论是从中国领导人在会上所受到的礼遇上看，还是就中国所起的实际作用而言，两次峰会都印证了中国在新世纪的世

51. 《外媒：中国经济今年“保八”有望 2027 年或超美国》，人民网，2009 年 4 月 27 日。

52. 戴维·林奇：《20 国峰会改变全球政治》，《今日美国报》2008 年 11 月 17 日。

53. 《G20 峰会开启世界新秩序 崛起中国“破茧而出”》，《环球时报》2009 年 4 月 4 日。

界格局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预测未来，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将会有更多更大的作为，但是仍会聪明地保持低调。2009年5月20日在布拉格出席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谈到中国的发展前景和作用时重申：“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实现现代化还需要长期努力。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奉行互利双赢的开放战略，绝不谋求霸权。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一两个国家或大国集团不可能解决全球的问题。中国愿同所有国家发展平等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⁵⁴。这就是中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自我定位和国际责任意识的自白，也是对国际舆论和各种猜度的正面回应。图虚荣，招实祸；避虚名，得实惠。韬光养晦，求真务实，这就是东方智慧，中国的实践理性。

二、中国经验

1. 中国发展的经验

笔者曾在《九死一生》和《发展社会学》⁵⁵中，通过回顾世界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对世界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理论给出了十点初步探讨性的结论。此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紧紧吸引我们继续进行追踪研究，并从国内外的研究者的论著中受到启发。无论就中国而言，还是从全球整体看，现在大体正处于现代化的中期阶段，离全面实现现代化还需要几十年，当下还不可能作出完成形态的理论总结。笔者在这里接续既往的研究，将新的感受和再思考的所得，作三点延伸和补充，作为对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经验总结。

(1) 人为本

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类历史是由人创造的。民为邦本，这是中国两千多

54. 参见《温家宝出席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新华网2009年5月21日），吴建民《温家宝总理：“G2”的提法不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5月25日）及凤凰卫视温家宝会记者招待会讲话现场实况报道。

55. 张琢马福云著“发展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年前的政治家和先哲就已确认的金科玉律。此番中国的改革正是由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极端贫困的农民绝地求生，私下分田包产单干开始的。接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也是农民进向产业化的创新。吃苦耐劳的3亿“农民工”⁵⁶是30年建设的元勋。当然还有全国人民的协同努力。人和人的需求，既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的目的。人口多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也是发展的潜能所在，在其被禁锢的时候，便是最沉重的包袱：“谁来养活中国？”在其能量释放出来的时候，便是最强大的动力：“中国是创造奇迹的国度！”世界最庞大的人口，造就了中华文明。人的觉醒和人的素质的相应提高，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形成中国今天的经济规模、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最基本的要素是中国的人口规模及其巨大的能量。中国今后的持续发展仍依赖于全国人民的作为。人为本就是社会发展的本体论。

(2) 渐进改革

人创造历史，除了依托自然环境以外，还必须有相应的社会环境，保障人的创造力得以发挥。改革开放前困扰中国发展的根本症结就是对人的禁锢。而1978年以来的改革，就是从对农民的“松绑”和思想解放开始的，就是人的重新解放，发展主体的解放，生产力的解放。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过程，由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思想文化观念等构成的社会环境也必须适应现代化的推进及时作相应的调整，也就是不断改革。中国进向现代化的改革和发展，既有明确的大方向，又有切实的阶段性目标和执行能力。大胆而谨慎地在探索中逐步推进，深谋远虑，思路清晰，审时度势，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推进的速度，脚踏实地“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地趟开成功之路。今后的持续发展，仍依赖于不懈地改革和创新。

(3) 把握机遇

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是在先发展国家的外烁下，被动地走上现代化之路的，但是经过百多年的坎坷曲折，尤其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地向“左”转，又转回到了自我封闭的死胡同。1978年，中国再行自主开放，打

56. “农民工”，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约定俗成的对户籍身份为农民，而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作者的特殊称谓。自20世纪中期即已入政府文件和学术论著，成通用概念。

开国门一看，映入眼帘的首先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电子信息技术的进展尤其令人震撼，“数字鸿沟”为当时讨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差距时常见的时髦辞。发展中国家要追赶发达国家就得跨越这条鸿沟。中国重新开放以后，首先正是知难而上，由此切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并带动其他产业全面发展。而今中国不仅已成了民用电脑、携带电话及各种数控家用电器的最大生产国，更由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大批量的生产，成倍地降低了IT产品的成本，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共同受惠。现在，连最落后的非洲地区，借助无线网络通讯工具享受远程优质教育和医疗诊治服务，也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奢望。加纳的年轻人几乎个个都持有中国产手机。数字鸿沟变成了数字桥梁。信息革命既是全球化的动力，也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契机。后发展国家只有积极果断地抓住机遇，才能把后发展优势发挥出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大规模现代性消费品生产，实质性地降低了跨入现代化的门槛，不仅使中国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受益，也使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得以廉价地获得原来只有支付力强的高收入阶层才能享用的产品。中国的发展惠及全球。

同样，在经济体制机制上，中国也是得益于借鉴发达市场经济体的体制和经营机制的优长，来培育自己的市场要素、构建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基本实现了向市场化的转轨。但同时并没有放弃或削弱政府及国有经济的作用，而是通过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更增强和优化了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能力，同时通过改革、改造培育出了内为国民经济支柱、对外参与国际竞争的强大的国有企业群，从而形成了整合多种经济成份和社会组织的复合动力机制，成为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强劲动力。在对外贸易中，在充分利用国际经贸组织及既定的国际规则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款的同时，巧借优惠时限的倒逼作用，加紧中国现代市场要素的培育和市场机制的建构，加速了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利用倒逼作用的最新范例，就是在这次金融－经济危机中，乘势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的压力转变为加速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通过这场危机的洗礼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升到更高、更健康的新水平。

这种倒逼机制的利用，不仅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其他领域也收到了不同程度的效益。如在政治方面，在人权问题上，面对种种责难，在回击恶意的诬蔑、澄清事实的真相的同时，冷静分析，实事求是地对待逆耳的反映，诚恳听取中肯的批评，变压力为动力，转被动为主动，更加重视、

并切实解决确实存在的问题，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强化人性化服务和执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把握住时代的机遇，清醒地分析后发展条件的二重性，趋利避害，尽可能充分发挥后发展优势来弥补后发展弱势，以成就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又一长久受益的宝贵经验。

这些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的基本经验来源于积久的中华智慧⁵⁷、近代以来现代化先驱者的艰苦探索、尤其改革开放前 30 年以高昂代价换来的痛苦教训。这些经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中得到了初步验证和丰富，将于今后的持续发展中不断深化和发扬光大。

2. 中国经验的启示

中国所取得的初步成功的经验对世界的贡献和启示，是由中国国情的属性及其经验的复合结构决定的。下面，再从三方面加以归纳。

首先，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发展道路基本上为两条，即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和美国式资本主义道路。苏联－东欧解体，放弃公有制和社会主义之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式民主被自我定位为“历史的终结”即人类的终极价值，并到处强行推销。但是按这种价值观发动的“颜色革命”和标榜的民主政治，在实践中却往往适得其反，不但未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权利、社会秩序和经济繁荣的实惠，反而搅得无政府主义泛滥，留下一个又一个社会失范、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乱摊子。而中国，作为与西方文化异质性最大的东方文化的发源地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摒弃“姓‘资’姓‘社’”之争，独立自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古今中西兼容并包，取各国之长，走自己的路⁵⁸，树立了非西方国家开辟现代化道路的新典型，并为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初

57. 博大精深的中华智慧，不单是儒家思想，还包括诸子百家学说的丰富内容，以及后人两千余年的承传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处处见到这些智慧在生动的实践中的闪光，例如：道家道法自然、以柔克刚的哲理和辩证思维；法家重农、富国强兵、法律平等及法术势的兴邦治国的理念；墨家崇尚勤俭、博爱和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精神；兵家深谋远虑的战略、沉着冷静的心理、韬光养晦的策略和机动灵活战术；纵横家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统战和外交上淋漓尽致的发挥；等等；以及这些智慧结晶的综合运用。

58. 张琢、马振铎《取各国之长 走自己的路》，《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 年第 3 期。

步成功的新经验。

其次，与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社会经济制度的剧变不同，中国按自己的渐进改革的方式，摸索着稳步地推进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能在转型过程中成功地实现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地增长，市场经济机制日臻完善。渐进而又快速，中国经济体制成功转型的经验，又为像越南等同类原来实行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革新）提供了更切合实际的参考。

再次，既往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意味着原有的平衡的打破，导致冲突和战争浩劫，两次世界大战的成因和后果就是惨痛的历史见证。而中国的发展不仅颠覆了非公即私、非社即资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还克服了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凭借日益增长的实力和精明的东方智慧结合，成功地实现了和平崛起，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可靠的和平与更普遍的繁荣。作为蒸蒸日上的世界大国，当世界深陷金融危机时，中国又携雄厚的储备金和改革经验，充实亚洲和世界的外汇储备库，加强区域和全球财经合作，促进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和更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为低迷的全球经济注入强大的驱动力，并在理论上为处于困惑中的探寻人类前途的思考者以新的启发。中国受惠于世界，也施惠于世界。面对被多种矛盾冲突困扰的世界，中国把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延伸于国际，倡导建立和谐亚洲－和谐世界，给人类以慰藉。这是全人类的福气，也是中国的发展成果和发展经验的普惠价值。

三、两点理论探讨

1. 关于经验与模式

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一向重视经验总结；而国外发展研究，更热衷于发展模式的探讨。笔者既往的著作中的用语，则“经验”与“模式”互见。近年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发展研究更聚焦中国，“中国模式”频频出现于各种论坛，遂促使笔者对“模式”再三思考，感到还是用“经验”较为合适，故此本目谓之“中国经验”。

那为什么要扬弃“模式说”呢？“模”和“模式”，源自木工学，后延伸于铸造工艺，再转借套用于发展研究。“模”就是造器物的模型⁵⁹，模式就

59. 左思《魏都赋》，“授全模于梓匠。”

是模型的样式或标本样式，是专门用以复制的，具有机械的、凝固的刚性特征。而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多因素复合的动态过程，在学习别人的长处和总结自己的经验时，最忌讳的就是模式化、凝固化。这是从照搬、照抄的懒汉们付出的无数代价中得来的经验教训。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按别人的既定模式复制（或“克隆”）出现代化的成功先例。一切以时代和国情为转移，具体条件具体分析，这是辩证法的灵魂。

不过，在各种关于“模式”的研究成果中，包含着研究者们辛辛苦苦探索出的许多可贵的、合理的、深刻的具体科学内容，不应连模子一同抛弃，所以本文不言“抛弃”，而用“扬弃”，这也是辩证法。

在众多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北京共识”）讨论的各种意见中，相对而言，笔者比较认同的是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中国通戴维·蓝普顿博士的观点。他说：“如果‘模式’意味着一个具体详细的计划，那么我认为没有所谓‘中国模式’。实际上我不相信存在这样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共识’是针对‘华盛顿模式’提出来的。当然，我们知道‘华盛顿共识’根本谈不上共识，特别是在美国金融体系最近发生问题后更是如此。‘北京共识’不是一个模式，而是试图反映一个现实。这一现实是，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同时维持了社会稳定。中国还有一项致力于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外交政策，以满足中国与世界合作的需要。由于中国在经济增长、稳定和争取世界和平两方面同时取得成就，这一结果为其在世界各地赢得尊重。因此，不应把‘北京共识’看作一种模式，它反映的是人们对使中国取得成功的政策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因为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就，其他人试图了解这些成就背后的政策”⁶⁰。这里所说的也就是中国其所以取得成功的经验。

作为学术概念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研究员给出了三个规定性：“第一，所谓‘中国经验’不同于‘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等概念，它不是仅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些特殊经历；第二，‘中国经验’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特定的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一些对深化关于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有探索意义的东西；第三，‘中国经验’是开放的、包

60. 严锋《“30年来，中国的发展是对全世界的贡献”——专访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参考消息》2008年10月9日。

容的、实践中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它尊重其他的经验选择，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的，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它的存在只是说明统一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⁶¹

2. 关于“普世价值”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方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博士撰文指出：“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⁶²。这是颇有见地的较深层次的区分。关于发展经验问题，笔者已作上述。下面且再就价值问题，略叙己见。近年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集中在“普世价值”问题上。

首先是存不存在所谓“普世价值”？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它不是超越时空的，而是具有时限性和阈限性的，即时空的具体性、相对性。既然存在具体性、相对性，那它也就具有绝对性了——绝对寓于相对之中，相对性与绝对性是同一事物同时存在的双重属性。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例，依笔者之见，最具时空的广延性的莫过于“道”。“道发自然”，天道，人道，为政之道，讲究的都是一个“道”字。它寓于一切事物之中，具有无限的广延性。但它作为一个最高的本体的哲学概念的提出，迄今还只追溯到大约 2600 年前的老子。以后，便有了影响至今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⁶³的社会政治取向问世。尽管道和道行的理念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但是作为一种价值观的形成、演化和影响还是有限的。而之所以相对而言，具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正在于它寓于生生不息的变动之中——只有运动是绝对的。所以毛泽东有诗云：“人间正道是沧桑。”⁶⁴

至于眼下热议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也并非西方文化中与生俱来固有的价值观。正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所说：“虽然西方价值观一直被认为是来源于基督教，但基督教义中并没有出现民主、法治国家、人权这些概念。这些价值观通通来源于‘启蒙思想’，是近二三百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式。”⁶⁵

61. 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第 17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 9 月。

62. 郑永年《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 年 11 月 25 日。

63. 《礼记·礼运》。

64. 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65. 赫尔穆特·施密特《主要国家应共同驾驭金融市场》，日本《读卖新闻》2009 年 1 月 7 日，参见新华通讯社编《参考消息》2009 年 1 月 11 日。

那么，启蒙运动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它是在市场经济勃兴的基础上，人文意识觉醒所致。在这一过程中，无数先觉者为他们的“异端邪说”和人权的实现付出了长期艰辛的努力和牺牲。譬如，意大利启蒙哲学的先驱布鲁诺，就因为主张人们有怀疑宗教教义的自由，于1600年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在罗马烧死。此后，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奋斗，法国启蒙思想家方得以发表“天赋人权”说，升起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旗帜。而直到布鲁诺被处死400年后，罗马教会才刚刚为之平反。因此，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称的毛泽东说，没有什么“天赋人权”，只有人赋人权。无论就理论上讲，还是从事实上看，毛泽东都说得对——无论你喜欢或者是不喜欢，赞成或者是不赞成。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先秦诸子的著述中，我们也不难寻觅人道、自由、自立、自强、民本、仁德、博爱、泛爱众、无差等、兼利天下……等等理念，经过历史长河的陶冶，或隐或显，传承至今。当然，这并不是如同某些国粹家们硬要将各门近现代的西学（新学）通通都归源于中国古代的“某子曰”，而只是意味着：古今东西并非是绝缘的，既然我们共生于同一个地球，又同属人类，总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相通、相近的思想存在。

东西文化，天各一方，有不同的源头，经历了不同的历程，从形式到内容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正因为差异大，才激发出彼此强烈的好奇、探索、比较的兴趣，在交流中互相启发，借鉴，获益：法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从传教士们那里获得的东方文化知识开启西方的启蒙运动；尔后东方人又历尽千辛万苦到西方寻找真理，把自由、平等、博爱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输入到中国来。一个世纪前，译介西方学术的前驱者严复，将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逻辑学等各学科名著翻译成汉文时，为找到一个与英文对应的贴切的汉语词，往往要绞尽脑汁，“一名之立，旬月踟蹰”⁶⁶。但是他终于成功地实现了“达悌”，并以自己的经验为后人立下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既见证了东西方文字和学理的差异性，也见证了其同一性（同一性寓于差异性之中）。

所以，问题不在是否存在普世价值的问题，而是如何辩证地理解和把握各种价值的具体性与普遍性的关系。认识某价值的时代性要用历史主义的

66.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

分析方法，这是史学方法论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贡献。认识某价值的社会性，它在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级（或阶层）、群体和个人中的具体体现，就既须了解其共生的社会环境（唯物史观尤其强调经济关系）和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及因此而形成的价值观的特殊性，即阈限性（包括地域性、国民性、民族性、阶级性、群体性和个体性，等等）。其中必然包含人类的共性（普遍的人性）、共生性、矛盾性、差异性、互动关系（相互依存与相互矛盾、互补与互斗、合作与分离、磨擦与磨合，等等）。

在全球化的现时代，和平与发展就是人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和愿望，即最宏观的普世价值——虽然各人、各国的具体诉求的内容和实现方式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大相径庭，而这正是其特殊性即相对性的体现。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需要获得的就是生存权和发展权⁶⁷。

时至今日，中国改革开放已三十年了，全球化日深一日地在各个领域迅速推进，有人竟然还僵滞在非此即彼，非“社”即“资”，非“东”即“西”，你死我活，绝不相容的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式里，就不仅太不合时宜，也辱没了先哲。救治之方，是睁开眼看一看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学一点辩证法。

主要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发表世界发展报告（各年）。
2.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3.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每两年发表一次的全球趋势报告。
4. 中国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各年）
5. 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
6. 蔡昉、林毅夫著《中国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和林毅夫其他著作。
7. 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9月。
8. 新华网等各主要网站信息。

67. 关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提出，据笔者有限的见识，最早见于鲁迅1925年5月8日面向青年的古国复兴的目标设计：“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于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为避免误解，还做了进一步解释：“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华盖集·北京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51～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提 要

今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改革开放亦逾三十年。前三十年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建国 -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 “三面红旗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折腾，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同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以 1978 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断为标志，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总设计师”和监护人邓小平将其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继夺取政权后的“二次革命”。改革开放和此后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尤其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现代化走向了成功的新阶段。同时，由于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辽阔的幅员、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智慧的积累，持续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不断创新的丰富发展经验，使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正改变着世界发展的格局和全球化的内涵。本文主要内容梳理了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在经济、社会、政法和文化诸方面的进展；中国的发展所引起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初步总结。